



□ 任俊华 胡丹丹

明末清初时期，涌现出了一大批提倡经世致用、心怀天下的爱国知识分子，顾炎武就是其中颇有影响力的一位。学生时代的毛泽东，曾把顾炎武《日知录》序言中有关政治理念和求学方法等内容抄录在自己的《讲堂录》里。1917年4月1日，毛泽东在《新青年》上公开发表了第一篇文章《体育之研究》，把顾炎武列为中国历史上少数几个“可师”的德智体并重之人。经世济民之道是顾炎武《日知录》思想的核心主题，反映了明清时期进步思想家的治学理念和社会责任担当，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优秀内容和时代精华。

“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

民本理念是顾炎武经世济民思想的出发点、落脚点和归结点，《日知录》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代源远流长的民本理念，关注百姓日常生活中遇到的民风礼俗、赋税田亩、职官选举、水利河渠、漕运监铁、人才军旅等民生问题。顾炎武的弟子潘耒在《序言》中评价先生道：“事关民生国命者，必穷源溯本，讨论其所以然。”凡是有关民生国命之事，先生一定仔细考察、追本溯源，寻求事情发展的起因和过程。民生问题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为经世济民之要务，顾炎武引用《诗经·大雅》连用六个比喻，阐发爱护百姓、体恤民情的重要性：“天之阍民，如埴如篴，如璋如圭，如珣如携”，并提出了“厚生为本”民本思想，“然则祈天永命之实，必在于观民”，聆听百姓的心声，满足百姓的诉求，“敬天勤民”“与民同患”。

顾炎武关于“君、臣、民”平等的学说，极富现代学说特色，折射出

中国传统政治思想近代转型的新动向。古代有天子、公、侯、伯、子、男等不同的“班爵”，在顾炎武看来，班爵都是为百姓而设立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为民而立之君，故班爵之意，天子与公、侯、伯、子、男一也”。班爵不能离开百姓而存在，所以“非绝世之贵”。有班爵者食“班禄”，“班禄”指的是“代耕而赋之禄”，有爵位者管理国家事务，与老百姓一样，也是靠劳动吃饭，“禄”是他们为百姓工作、取之于百姓的报酬，以此代替耕作谋生。所以即使是天子也要为民谋事，“不敢厚取于民以自奉”“不敢肆于民上以自尊”。君为民所立原则贯穿了《日知录》政论思想的始终，顾炎武依据史书的记载，举了上古帝王敬民、爱民的具体事例，比如《尚书》中的《武成》《召诰》《毕命》等篇记载，周王出征、祭祀都是步行前往，“不敢乘车而步出国门，敬之至也”。为了亲身感受民生疾苦，深入民情，上古帝王与百姓共同参加生产劳动，“舜之圣也，而饭糗茹草；禹之圣也，而手足胼胝，面目黧黑，此其所以道济天下”。在敬爱百姓的基础上，顾炎武特别强调要对人民讲诚信，对孔子“民无信不立”的观点进行了发挥，要使“民无贰志”，就要以“诚”来对待百姓，用“信”来凝聚人心，如果真能做到这一点，当遭遇外敌入侵的时候，即使遇到粮草匮乏、兵器不足的困境，人民也会誓死保卫自己的国家。

“文须有益于天下”

顾炎武怀着“经世济民”的民本情怀，发出了“文须有益于天下”的治学号召。他说：“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

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文章之所以不能在天地之间消失，是因为它可以阐明道理，记述政事、体察百姓困苦、乐于称道别人的善行。像这样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文章多一篇，就有多一篇的好处啊。顾炎武先生的治学方针，具有鲜明的为现实服务导向，提倡做学问以“明道”“救世”的基本理念，拒绝空谈，而是要与活泼的生活实际联系起来，通过理论联系实际解决国家和人民遇到的现实问题，他说：“君子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做学问如果脱离现实、脱离生活、脱离民众，空虚之风日盛，务实之学日疏，会导致“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的惨状发生。

《日知录》主张“明体适用”“博学于文”、通变创新的学术研究方法和路径。顾炎武精研易学，从《易》中追溯“体”、“用”的哲学起源——《易》曰：“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又曰：“显诸仁，藏诸用。”在顾炎武看来，“天地之大体”包含了“阴阳合德”的天地万物运行规律和仁以致用的社会实践规律。大自然生生不息，四时周行，一刻也不停地运转着。人在宇宙万物的周化流行大道上，与时偕行，自强不息，拥有着自身特殊的宇宙地位和现实使命。顾炎武关于“体”“用”问题的研究，有着十分明确的实践导向，一切经天纬地的学问都是文，所以学者需要深入鲜活的社会现实，到人民中去，到实践中去，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经世济民事务中，进入“博学于文”的生活大课堂：“君子博学于文，自身而至于家国天下，制之为度数，发之为音容，莫非文也。”在

《日知录》卷二《彝伦》条中，顾炎武明确地反对孟子把“彝伦”仅仅局限于“人伦”的观点，而是将其内涵扩展到“天地人之常道”的广阔范围。他认为“彝伦”乃“天地人之常道”，要认识“彝伦”，不仅要懂得关于人伦的知识，还要观察关于“天地”的知识，建立在对自然和社会的综合性知识的认知基础上，达到“尽人之性、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的治理境界。

天地生生不息，世间时势万变，做学问也需与时俱进，不断创新，顾炎武提出了“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而后为之”的学术创新观点。顾炎武不仅以运动不息的观点去探索大自然规律，也以发展变化的观点去观察社会历史的运动规律，认为人类社会中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宋儒的先验之“理”，而是客观存在的“势”。“天下势而已矣”，“势”涵摄了军事、政治、风俗等多方面的历史辩证法内容，顾炎武在看到“势”作为历史发展的某种趋势或必然性的同时，也意识到了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能动的推动力量。追求学术的时势性、创新性，让学问真正起到启迪民众心智、改变社会现实以及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明体适用”“博学于文”、通变创新的治学方法将学问与实际联系起来，注重理论转化，提炼出匡时济世、服务民生、救国救民的治学方略，具有很强的现实导向。



推进跨文化交流的四条途径

□ 邓凌月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灵魂和独特精神标识，积淀着一个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坚定文化自信。他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他特别注重在文化自信基础上的人类文明成果借鉴与融合，强调指出，只有充满自信的文明，才能在保持自己特色的同时包容、借鉴、吸收各种文明的优秀成果。一直以来，中华文化秉持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多元一体格局，不断吸收借鉴异域、异族文化中的优秀成果，始终坚持与其他国家和民族开展跨文化交流，为增进中国与不同国家、民族间的理解互信，实现文明互鉴和民心相通创造了有利条件。

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跨文化交流也面临着新的问题与挑战。一是文化认知定势。由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民族或国家的民众，基于自身固有的意识形态、文化背景、认知环境等，先行形成了对他国文明与文化的固有认知和看法，影响国际的文化交流互鉴。二是文化圈层隔阂。受不同国家和民族特定自然环境以及特有的政治制度、法律体系、宗教信仰、意识形态、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等影响，人们有时会以自己圈层的文化作为标准和参照去评判其他文化圈层，造成理解和认同阻力。三是文化传播方式固化。当前，文化产品还有

待进一步满足提升国际话语权的文化信息需要。四是文化交流合作机制有待完善。目前，从国内来看，各地的文化交流合作机制有待完善，民间文化交流的鼓励性政策和措施还有待加强；从国外来看，不同国家文化基础差异较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跨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开展。

加强跨文化交流，需在充分尊重各国间文化差异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文化传播理念和运行机制，让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

第一，推进跨文化共兴的发展态势。继续传承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精神，持续推进和而不同、多元一体的文明共荣、文化共兴发展态势，尽可能减少认知定势和圈层隔阂对各国文化传播与交流的影响，避免因文化价值观、认知评价标准、对外传播宣传策略等方面差异导致的跨文化冲突。本着互相尊重、互利互惠的原则，理性看待文化的多元性、包容性和交融性，以宽容友好的心态，求大同存小异，既保持本国文化的鲜明特色和创新性传承，又认同他国文化的和谐共生、多元并存，促进各国文化交流合作，在开放包容中发展，在发展中开放包容，让现代文明成果更多惠及各国人民。

第二，扩大跨文化交流的辐射范围。在充分尊重各国间文化特质的基础上，围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各国文化的交流与互鉴，结合国际化跨文化传播要素，打造既具有民族鲜明特色又符合国际受众需求的文化产品和

文化服务。加大文化产品创新化、精品化力度，为世界各国人民创作更具吸引力、感染力和影响力的文化精品，通过优秀作品的海外展播、演出、评奖，扩大跨文化交流辐射范围，让中华文化优秀基因和文化精髓“走出去”，为文化产业化铺路搭桥。鼓励文化企业到其他国家投资文化项目，促进政府间和民间文化贸易交流与合作的开展，提升本国文化产品在世界文化市场上的竞争力和占有率，发挥好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的统筹协调和联动创新作用，推动文化贸易取得新成效。

第三，实现跨文化传播的转型整合。展现真实中国，展示大国形象，提升国际话语权，需提高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能力。在当前移动通信和数字化趋势下，通过新技术应用实现跨文化传播的传播转型和创新，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打造互动、开放、共赢的传播新局面。在传播内容上，要重视对外话语体系的转换和构建，努力构建既具有本土化、特色化又充分考虑各国文化多样性、尊重各国文化习俗的跨文化传播内容体系，克服跨文化交流中的文化差异、思维差异、语言差异、信仰差异，更多运用平民化视角，更加注重人文关怀，更具亲和力 and 感召力，以各国民众乐于接受的方式和易被理解的语言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阐释中国特色，真正使文化信息与各国民众心心相通，引发情感共鸣，形成文化认同，实现对中华文化的有效传播，向世界各国展示内含

中国智慧的大国形象。在传播方式上，应当充分利用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互动性、开放性、迅捷性等传播优势，依托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多媒体传播平台，通过文字、图片、视音频、网络直播等数字化、网络化传播形式，实现跨文化传播的传媒介转型整合。

第四，构建跨文化合作的长效机制。扩大交流规模，拓展交流领域，畅通交流渠道，打造交流品牌，须构建跨文化交流合作的长效机制。要发挥全国各省市自治区自身优势，整合各方力量，构建国内文化交流合作机制，夯实跨文化交流的基础。重视我国与世界各国民间交流渠道的畅通与完善，搭建好民间文化交流合作的桥梁，部、省层面应制定和完善财税、法律等方面的政策措施，加大鼓励民间开展跨文化交流的工作力度。制定我国与其他国家间文化交流与合作的中长期发展规划，结合各国不同的文化基础、文化体制，实现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共享，形成各具特色的文化窗口，不断拓展文化合作领域，使跨文化交流成为传播中华文化、增进世界各国理解互信、促进各国文化交流互鉴的纽带。



当代中国正处于实现中国梦的关键历史时期，实现国家繁荣、民族复兴、社会发展、人民幸福的责任，历史地落在新时代青少年的肩上。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作为时代新人，要承担起这些重大历史责任，就必须深刻认识劳动教育的重要性，树立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价值观念，培养勤俭、奋斗、创新、奉献的劳动精神。

勤俭、奋斗是具有鲜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特征的劳动精神。《说文解字》释：“勤，劳也。”这说明，“勤”与“劳”的意思是相通的，甚至可以说，“勤”的主体意义就是“劳”。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最悠久的文明，中华民族作为中华文明的载体，之所以能够生生不息、历久弥新，就是因为具有勤劳节俭、艰苦奋斗的品质。因此，在历史上，中华民族不仅以“礼仪之邦”享誉世界，也因为她的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而声闻遐迩。

《说文解字》释：“俭，约也。”段玉裁注：“约者，缠束也，不敢放奢之意。”可见，俭即俭约、不奢侈放纵的意思。《尚书》中把“克勤于邦，克俭于家”联系起来阐述，说明古人很早就意识到勤劳与俭约之间具有一种天然联系。勤劳之人大多生活俭约。只有亲身经历过体力劳动的人，切身体会过烈日炎炎下“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艰难，才会珍惜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当这样的人再读到“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诗句时才会产生深刻共鸣，自然就会崇尚俭朴、有节制的生活方式。这就是“习劳知感恩”的道理。在家庭教育中，如果父母不重视对儿女的劳动教育，结果必然是孩子不懂得感恩、惜福，视父母的付出为天经地义、理所当然，久而久之，坐享其成、不劳而获等品行自然就会养成，不利于其成长和发展。《政要论》中说：“历观有国有家，其得之也，莫不阶于俭约；其失之也，莫不由于奢侈。”

因此，中国古人的童蒙养正教育特别重视对孩子的劳动教育。《弟子规》的“不力行，但学文，长浮华，成何人”，孔子的“力行近乎仁”，陆游的“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等，强调的都是书本教育要与劳动实践相结合。新时代的学校教育，也必须重视培养学生勤俭、奋斗的劳动精神，这样才能避免培养出的学生仅能夸夸其谈，纸上谈兵，而缺少生活能力、动手能力，以及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精神，才能顺利实现新时代教育立德树人、立德树人的总目标。

创新是具有鲜明新时代特征的劳动精神。在新时代的历史坐标上，社会及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智能化、电子化、机械化、高科技化成为时代的鲜明特征，与此相应，劳动形态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新时代的青少年需要适应新时代劳动教育的特点，正确理解劳动教育的新意蕴，在正确形态的劳动中培养创新精神，实现创造性劳动及劳动成果的创造性转化，通过创新科技、创新方法、创新思路等实现高效、节能、环保、利民等价值目标，通过创新劳动创造财富、创造辉煌，不仅能够跟上而且能够引领新时代飞速前进的步伐，从而实现自我价值。

奉献是具有鲜明社会主义特征的劳动精神。共产主义信仰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在劳动中培养奉献精神的思想支撑。马克思在中学毕业论文中写道：“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习近平总书记当年在陕北贫



瘠的黄土地上，就开始深入思考人生问题：“15岁来到黄土地时，我迷惘、彷徨；22岁离开黄土地时，我已经有着坚定的人生目标，充满自信。作为一个人民公仆，陕北高原是我的根，因为这里培养出了我不变的信念：要为人民做实事！”正是这种为祖国、为人民奉献自己的信念，使他提出：“我们共产党人讲奉献，就要有一颗为党为人民矢志奋斗的心，有了这颗心，就会‘痛并快乐着’，再怎么艰苦也是美的、再怎么付出也是甜的，就不会患得患失。”他还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并且发出了“我将无我，不负人民。我愿意做到一个‘无我’的状态，为中国的发展奉献自己”的铮铮誓言。

革命导师和国家领袖的亲身经历表明，一切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劳动都是崇高而伟大的、幸福而快乐的。正如教育家马卡连科曾说：“劳动最大的益处还在于道德和精神上的发展。这种精神发展是由和谐的劳动产生的。”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通过志愿劳动、义务劳动等培养时代新人的奉献精神，形成他们助人为乐的美德，不仅可以避免在劳动中唯利是图、斤斤计较的功利取向，还能够成就时代新人高尚的道德品格，提升时代新人的精神境界。

“勤俭、奋斗、创新、奉献”是具有鲜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征、新时代特征和社会主义特征的劳动精神，对于树立时代新人的正确劳动价值观，培养时代新人的崇高劳动品质，塑造时代新人的健全人格等都具有重要意义。重视新时代劳动精神的培育是培养时代新人的必然要求，承传良好家风的前提条件，贯彻实干兴邦的具体表现，更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保证。因此，全社会都应该广泛开展劳动教育实践活动，重视劳动精神的塑造和培养，使之贯穿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的全过程。

